



史記研究

张大可 著

11(4)/18

121.0783

张

大

可

著

史記研究

程金蓮書



责任编辑：黎尚诚

封面设计：郭宝林

技术设计：陈安庆

史记研究

张大可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5 插页2 字数358,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

书号：11096·97 定价：2.70元

R007/07

目 录

司马迁评传(代序).....	(1)
论史记成书的历史条件.....	(41)
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	(58)
司马迁生卒年考辨.....	(74)
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	(108)
太史公释名考辨.....	(121)
史记断限考略.....	(138)
史记残缺与补窜考辨.....	(162)
关于史记续补与亡篇散论二题.....	(188)
史记体制义例简论.....	(203)
论史记取材.....	(230)
简评史记论赞.....	(272)
论史记互见法.....	(290)
司马迁怎样塑造历史人物.....	(308)
试析将相表之结构与倒书.....	(319)
试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338)
论司马迁的历史观.....	(361)
从司马迁写当代史看他的政治观.....	(382)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述论.....	(402)

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试探.....	(419)
韩信诚蒙冤 谋反亦不诬.....	(436)
司马迁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448)
三十年来史记研究述评.....	(470)
后记.....	(489)

司马迁评传

（代序）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他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卒于昭帝之初（公元前八十六年左右），享年仅六十岁^①。司马迁的一生恰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相终始，正值西汉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制度确立以后的第一个盛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空前蓬勃的发展局面。司马迁降生在这个盛世，完成了空前的历史巨著，正是应运而生。

一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西汉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西汉初建时，社会经济凋敝，国穷民贫，“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民失作业而大饥馑”^②，汉朝统治者为了赢得农民的拥护和重建地主经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提倡“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巩固了统治地位。经过高、惠、文、景四代的经营，到司马迁成长的汉武帝初年，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司马迁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

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③。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④。全国兴起了几十个大都会。随着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也繁荣起来。汉武帝即位，锐意兴革。对外用兵，抗匈拓土；对内兴作，多所建树。他访求和超拔人才，“群士慕响，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⑤，造成了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极盛。西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涌现了出来，表现了这是一个非常灿烂的时期^⑥。这一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就是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历史背景。

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⑦。三者之中，“尊汉”实为《史记》撰述之大旨。所谓“尊汉”，就是宣扬汉家一统带来的天下大治。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在汉武帝手里才巩固下来，这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也是中国古代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为它大喊大叫。这一点司马迁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说：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桀。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⑧。

可是在秦汉之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⑨。在剧烈的变动之中，司马迁看到了历史走向一统的方向。他为了探索这一历史的发展原因，追溯到了古

代，写成了一部贯通的历史书。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⑩所谓“空言”，指的是理论说教，例如董仲舒讲的《春秋》大一统，就是思辨哲学；“见之于行事”，指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发展史学。在西汉初年，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是一个具有紧迫感的现实问题。贾谊的《过秦》、贾山的《至言》等政论就具有作历史总结的内容。贯穿于《史记》全书的精神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本是儒家学派宣扬的王天下的理论。但是，司马迁通过生动的历史叙述来说明这条真理，完满地回答了为什么秦亡汉兴的复杂历史。司马迁肯定秦始皇的统一之功，评价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⑪，但是对秦朝的暴虐统治却作了无情的批判，所谓“抑秦”者指此。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这说明司马迁是自觉地认识到了时代的要求而总结历史的。

统一的西汉王朝，不仅提出了总结历史的要求，而且提供了修史条件。秦汉时代的书籍主要是用竹木简牍书写，阅读和传播都十分困难，大量书籍藏于皇室。秦始皇“燔灭文章，以愚黔首”^⑫国家所藏《诗》、《书》典籍及诸侯史记都被烧光了^⑬，并禁止民间藏书读书。汉朝建立后，废除了挟书律，鼓励民间献书。班固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⑭。于是，“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⑮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为史官，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成为最博学的人。《史记》虽为私修之史，但并不是一部隐秘之作，司马氏父子是以皇室史官身份修撰的，得到了官家之助。司马迁不仅“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而且动用了官府的人力，那些“写

书之官”就是太史令属下的书史。学术界评价《史记》以后世个人撰述的观念过份强调司马迁的私撰，是不妥当的。

西汉文景之世，实行开明政治，贾谊、贾山等人曾发动过一场批判秦朝暴政的运动，思想界很活跃。这样的历史背景也为司马迁畅抒己志，“成一家之言”创造了条件。

上述种种，说明了盛大的西汉王朝给予司马迁修撰《史记》的影响，提出了时代的要求，提供了修史的条件。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地演化着的。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既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统一盛世，同时也是一个阶级矛盾激烈发展着的时代。汉初休养生息，使皇室、封君、官吏及整个地主阶级享受了太平盛世的福音，“畜积岁增，户口寝息”。但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却因遭受豪右的欺凌，地租及高利贷的剥削，加上对国家沉重的赋役负担而走向贫困，卖爵鬻子，日有所闻。文帝时的贾谊就发出了“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的慨叹^⑩。汉初奉行无为政治，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⑪。这种局势给汉武帝提出了必须对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发展。所以，汉武帝的多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汉武帝的作为，基本上应该是肯定的。但是，由于汉武帝无节制地使用民力，在他的后期造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残破局面^⑫。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的事业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此后，繁荣的西汉王朝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一步步走向衰败。司马迁创作的鼎盛时期在太初、天汉之际，恰值西汉王朝由盛入衰。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受李陵祸之前已经碰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时局的变化不能不给予司马迁的思想方法以及《史记》的内容打下深刻的烙印。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

制主义的黑暗，讥讽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史记》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上的矛盾，正是与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

二 家学渊源和师承

司马迁追叙先世，祖源久远，为传说的颛顼时代掌管天地的重黎氏之后。重黎氏历经夏、商，世世代代职掌天地。到了周代，重黎氏后代有个封于程的伯爵名叫休甫的人，做了司马这个官，从此程伯休甫这一支姓司马氏。司马氏在周宣王时重掌史职，世守其业，到东周惠王、襄王时，王室内乱，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在各个地方，战国时出了不少的名人。司马迁祖上这一支，公元前六二一年因晋室内乱而奔秦，迁居少梁。少梁，即今陕西韩城，古梁国，附属于晋，在公元前六四一年为秦穆公所灭。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二七年）改名夏阳，隋以后更名韩城。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龙门，山名，横跨在黄河两岸，东段在山西河津县北，西段在陕西韩城县北约五十里。黄河穿越龙门，“两岸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⑨传说每年暮春，总有成千条鲤鱼游聚龙门山下，跳越龙门，跳上去的就成龙升天。这种传说给人们的想象增添了驰骋的翅膀，使龙门成了神圣之地，其名悠久，载于《尚书·禹贡》。所以司马迁引龙门以重桑梓，自称生于龙门。司马迁的实际生地韩城县南二十里的芝川镇。司马迁自述他的六世祖司马靳葬华池，四世祖司马昌，曾祖司马无泽，祖司马喜皆葬高门。华池离高门三里，均在芝川镇西北。相邻有司马坡，今存有司马迁祠墓。至于“耕牧河山之阳”，更不能按字面理解，认为司马迁从小过着耕牧的

生活。司马迁祖上颇有产业，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时为五大夫。五大夫为第九级爵，汉初七级以上为高爵，有食邑。司马喜无功勋显绩，在文帝时得五大夫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汉文帝纳晁错策，颁布卖爵令。富人入粟实边，最高爵可买至五大夫，复一人。四千石粟相当于四十户五口之家的自耕农家庭收入。所以“耕牧河山之阳”，指的是司马迁在乡间度过了他的美好童年。这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意识地把司马迁留在乡下龙门接受山川的陶冶，培养他具有开阔的胸怀和热爱山川人民的感情，为他的二十壮游打下生活的基础。

司马谈是汉武帝时代的太史令，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虽然太史令厕于下大夫之列，秩比六百石，仅与一个博士官的俸禄相等，但司马谈十分珍惜这一职掌，把它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司马谈重视这一职掌，为的是完成他的修史理想，所以遗命司马迁必为太史。司马谈用“世典周史”这一光荣家谱来教育司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的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家。司马迁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代史籍了。司马谈出仕在京师，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少年时期未在父亲身边而能“十岁诵古文”，由此可见司马氏之家规家教的谨严。当青年司马迁来到父亲身边，成为他的修史助手的时候，老人的思想品格和学问所给予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的。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司马迁一家也徙移到茂陵，属籍显武里。司马迁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〇年），生年不详。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这三个人都是西汉时代活跃于朝廷的

大学问家。天官是天文学，由于古人观测天上的日月星辰，赋以君臣、尊卑、百官之称，所以称天文学为天官。唐都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史记》卷二十六《历书》说：“至今上即位，招致天下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晚年他还和司马迁、落下闳一起参与了太初历的改制工作，也是司马迁的师长。《易》讲阴阳吉凶，杨何是汉初著名的《易》学专家，字叔元，菑川（今山东寿光县）人，在《史记》、《汉书》两书的《儒林传》中均有传。司马谈学天官和《易》，这是史官必备的知识和职掌。这些知识又传给了司马迁。所以司马迁对历法、天文、阴阳等专门知识也十分精通。道论是文景时代的官方哲学。黄子就是景帝时的博士黄生，他曾在汉景帝面前与儒生《诗》博士辕固生展开了一场汤伐桀、武王伐纣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意在禁绝一切臣民暴动，维护汉家政权。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是为刘邦取得天下而辩护。所以文景时期的儒道之争并非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之争，而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的思想派别之争。汉武帝初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思想相对立，也是这样的。《论六家要旨》十分推尊道论，表现了成长于文景时代的司马谈所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很深，但并不能据此证明司马谈是一个道家的信徒。效《春秋》而作《史记》就是司马谈的理想。他还指导司马迁广博地学习百家之学，特别是把儒学放在首位。司马迁在京师拜了两个儒学大师为老师。一个是今文学大师董仲舒，司马迁向他学习《公羊春秋》，接受大一统思想；再一个是古文学大师孔安国，司马迁长期向他学习《古文尚书》，《史记》中多所征引。司马迁在这样的家学和师承的熏陶下，成长为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这是别人所不能具备的主观条件。

这里需要着重探讨一下《论六家要旨》的思想旨趣和对司马

迁的影响。

《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司马谈在评论中全面肯定道家，而对阴阳等五家论长道短，肯定其所长，批评其所短，鲜明地表现了前一代思想家所受的时代熏陶。《史记》中许多论赞流露出道家的观点以及许多篇章对儒家人物的批评，就是司马迁接受父亲思想影响的痕迹。这篇论文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个半篇。上半篇评论六家得失指归，下半篇用传体对上半篇的观点加以解说和论证，它很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发挥，至少是经过司马迁润饰的。班固父子就把《论六家要旨》直接看成是司马迁的思想^②。但司马迁是在儒学独尊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更崇拜的是孔子及其儒学，所以在《史记》一书中称引孔子的话比比皆是，“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就是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一个重要标尺。父子两代人是存在着思想差异的，这也是影响《史记》内容呈现矛盾性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司马氏父子的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一以贯通的，即对百家学说兼收并蓄，熔铸贯通自成一家。《论六家要旨》强调百家之学殊途同归，皆务于治，人君不应禁绝，而应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表现了司马谈治学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司马迁完成《史记》，包容百科知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③，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界往往引用《论六家要旨》的话来评论司马迁的思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反之，过分强调父子异趣则是不妥的。我们既要看到父子思想的异趣，更应看到父子思想的统一和贯通，更直接了当地说，遗存在《史记》中的司马谈思想，包括《论六家要旨》，即是司马迁的前期思想。因为青年时期的司马迁是受父亲思想支配的。

这些情况是我们研读《史记》时必须把握的。

三 二十壮游

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司马迁二十岁，正当盛壮之年，怀抱着凌云壮志，进行了一次全国漫游的学术旅行。《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五引卫宏《汉旧仪》说：“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这个故事是卫宏记载的传闻遗事，从年龄上说与《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不符，是不可信的。但这个传闻与《自序》所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目的相合，说明司马迁的二十壮游是走出书斋，面向社会作调查，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现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此行是在司马谈的决定和指导下进行的。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一场考验。司马迁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学术旅行，求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在《史记》许多篇章的论赞中一再论及旅游的收获。这标志着司马迁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史学家，是父亲的一个好帮手了。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故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碭、睢阳至梁（今开封），回到长安^②。

二十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去作实地考察，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司马迁“浮于沅、湘”，追寻屈原的足迹，思考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想着屈原的为人，禁不住悲伤流涕。司马迁在长沙还凭吊了贾谊的遗迹，感到他的遭遇和屈原有些相似，后来写了《屈原贾生列传》，创造了把不同时代人物合传的形式，这是历史比较法的雏形。《史记》中的类传则是历史比较法的集中表现。这种方法使《史记》别开生面，大约就是司马迁在壮游过程中受到民间传说的启发而孕育成的。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搜集了关于五帝三代的古史传说，为他后来写《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作了准备。最值得称赞的是，司马迁在淮北对近现代史作了深入细致的寻访调查，比如陈涉少为庸耕有鸿鹄之志的慨叹，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亡下邳，陈平为社宰，周勃织薄曲，韩信贫居葬母高敞地，刘邦好酒及色等等，都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具有这样的实践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司马迁的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除历史事件外，有关人物遗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无不广泛地作了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如胸中。顾炎武评论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识也。”^②这是司马迁在史事方面所得游历之助。苏辙云：“太

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②4}这是司马迁在文章辞采风格方面所得游历之助。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遗文古事；而且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他的识见和才干。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四 从入仕郎中到太史令

司马迁从元朔三年壮游到元鼎六年以郎中身份奉使巴蜀，其间有十六年。这期间，司马迁的重大活动，一是壮游，二是从孔安国问故，三是入仕为郎中。司马迁的二十壮游用了多少时间，文献没有记载，以情理推论，至少要花费一两年时间。孔安国为博士在元朔二年，元狩五年为谏大夫，元狩六年出为临淮郡太守，那末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应当是在他壮游归来至元狩六年之前这一段时间，是没有疑问的。这期间，司马迁时年二十三、四至二十八、九。

司马迁出仕为郎中，绝对年代不可考。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依王国维的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公元前九十三年），由此上溯二十九年是元狩二年，上溯二十一年是元鼎四年，则司马迁入仕时间当在元狩二年至元鼎四年之间。司马迁自述云：“余尝西至空同”^{②5}。王国维据《汉书》卷六《武帝纪》的记载，“元鼎五年冬十月幸雍，西登空同，临祖厉河而还。”推断说：“公西至空同，当是年十月扈从事。”这就是说，司马迁在元鼎五年之

前已入仕为郎中。元狩六年之前受学于孔安国，那末司马迁最早的入仕之年大约在元鼎元年（公元前一一六岁），是年三十岁。

汉朝的郎官系统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级。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郎官无定员，可多至上千人，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②，为皇帝的侍从，多由二千石高官子弟和富家子弟充任。郎官积资外迁，往往得为长吏，出守地方为令、长，是仕进的阶梯，平常亲近皇帝，所以人们感到很荣耀。司马迁虽然做的是最低级的小郎官，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下，他由一个秩比六百石的史官儿子得为郎中，已经是破格的了。由于司马迁超群绝逸的才干，很得汉武帝的信任。武帝从元鼎四年起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司马迁常为侍从。

元鼎四年，汉武帝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元鼎五年西登空同，北出萧关，带领数万骑打猎于新秦中，气派十分雄伟壮观。扈从武帝的司马迁，在观赏这些场面之后必将激发起无限的豪情。司马迁在《史记》中擅长于激烈场面的表现，是和他几十年扈从武帝的豪放旅游分不开的。元鼎六年春，武帝东巡至汲新中乡，发出了征略西南夷的命令，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地区，设置新郡。这次奉使，给司马迁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使他有机会深入民族地区作调查研究，为他后来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提供了生活的实践舞台，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司马迁三十六岁。这一年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作为顾问随从东行。但他到了洛阳就病倒了。正在这时，司马迁奉使归来，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拉着儿子的手，悲伤地留下了遗言，他要司马迁矢志继承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做太史令，完成通史著作。司马迁终身